

引用格式: 黄志刚, 黎洁.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J]. 资源科学, 2022, 44(9): 1905-1917.
[Huang Z G, Li J. Impact of the follow-up supportive policies of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on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ing households[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9): 1905-1917.] DOI: 10.18402/resci.2022.09.13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黄志刚, 黎洁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西安 710049)

摘要: 在新阶段中国减贫战略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的背景下,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作为巩固搬迁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 其对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亟待研究。本文将风险和社会排斥同时引入可持续生计框架, 构建“后续扶持政策→生计策略→多维相对贫困”分析框架, 并采用形成型结构方程模型对安康市、商洛市和渭南市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①总体而言, 包括产业、就业、公共服务等在内的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有效降低了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0.181)。其中, 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可以直接降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0.097), 也可以有效改善搬迁农户生计策略进而间接缓解其多维相对贫困(-0.084)。②风险(0.150)和社会排斥(0.088)均会直接导致搬迁农户陷入多维相对贫困, 当搬迁农户面临社会排斥和遭遇风险冲击时, 就会出现就业困难、收入降低、社会融入困难等状态, 从而陷入多维相对贫困。③搬迁后续扶持政策通过改善农户生计策略进而缓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减贫路径会受到社会排斥和风险的制约。其中, 在政府通过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改善农户生计策略的过程中, 社会排斥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0.160); 在搬迁农户通过生计策略转型缓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过程中, 风险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0.096)。未来仍需要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顶层设计, 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对多维相对贫困治理的靶向性。

关键词: 易地扶贫搬迁; 后续扶持政策; 生计策略; 风险; 社会排斥; 多维相对贫困

DOI: 10.18402/resci.2022.09.13

1 引言

根据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低水平陷阱理论, 贫困系统具有稳定性, 仅靠自身和市场的力量是无法打破的, 必须通过外在的政策力量治理贫困。“十三五”时期, 中国实施易地搬迁、产业扶持、兜底保障等扶贫工程, 消除了绝对贫困, 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然而, 对于刚脱贫的困难群体而言, 由于其在公共服务、社会参与等维度仍然存在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情况, 其中的大部分将转化为相对贫困人口^[1]。与生存型绝对贫困相比, 多维

相对贫困不仅表现为经济层面福利的相对不足, 也表现为非货币方面公共服务的相对不足^[2]。因此, 基于政策干预的角度, 缓解多维相对贫困的重点在于解决低保户、边缘户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低收入人口的稳定脱贫增收问题, 使其不仅能够维持温饱, 还能更好地享受健康、就业、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 进入中等经济社会阶层^[3]。

易地扶贫搬迁起源于资源环境承载力较低的深度贫困地区的反贫困实践, 通过“挪穷窝、拔穷

收稿日期: 2022-05-05; 修订日期: 2022-08-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AGL03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项目(720220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183);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论文奖学金项目(202011)。

作者简介: 黄志刚, 男, 河南新蔡人, 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移民反贫困与新型城镇化。E-mail: hzhigang@stu.xjtu.edu.cn

通讯作者: 黎洁, 女, 陕西西安人, 教授, 研究方向为农村扶贫与发展, 农户生计, 易地扶贫搬迁等。E-mail: jieli@mail.xjtu.edu.cn

根、断穷业”的方式,破自然灾害之殇,解贫穷落后之困。“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解决了近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取得了巨大的减贫成就^[4]。然而,搬迁农户的生存问题虽已得到解决,但其发展与共享问题仍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不足导致的工资性收入水平低下^[5],日常生活刚性开支较大导致的消费能力下降^[6],社会关系网络割裂导致的社会融入困难^[7],安置社区属地管理与归口管理的冲突带来的公共服务缺失^[8]等。综合而言,当前以基本可行能力不足为主要特征的转型性和发展型贫困问题在搬迁群体中逐渐凸显,具体表现为收入、物质、教育、健康、就业水平等明显偏低,这些成为后搬迁时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主要表现。

为巩固易地扶贫搬迁的脱贫成果,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2020年2月,国务院印发《2020年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从基本公共服务、产业培育、就业帮扶、农村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制定了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措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后文简称“后续扶持政策”)的减贫和发展逻辑是,采取特惠政策、制度安排、精准施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通过优化公共资源和生产要素配置,高效率配置公共资源,高强度转换产业格局,最终促进搬迁农户可持续脱贫增收和基本可行能力的不断提高^[9]。

缓解多维相对贫困的关键在于“提低、扩中、限高”,将金字塔型的经济社会分层结构逐渐转变为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普惠全体社会成员。当前,实际居住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人口多数是老、弱、病、残等困难群体,这些群体往往具有人力资本短缺、抗风险能力弱、返贫可能性高等特点,需要高度关注这部分群体的返贫状况和高质量脱贫。基于收入水平和基本可行能力的角度,深入研究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生成逻辑,并据此分析后续扶持政策缓解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机制,对于巩固并拓展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绝对贫困一般按照人的基本生存需求确定,而相对贫困是在满足基本需求以后追求更高层次的

发展和共享过程中存在的贫困,通常根据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按照人口比例确定,并且多数情况下绝对贫困标准要低于相对贫困^[10]。从目前国内关于相对贫困的研究区域和对象来看,有学者认为,以往绝对贫困集中的区域仍将是2020年后相对贫困的集中区,主要人群包括边缘户、政策兜底户、脱贫不稳定户等^[11]。相对贫困的测量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收入比例法”和“收入临界线法”两种^[12],而汪三贵等^[13]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可以设定一个包括收入维度和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非收入维度的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此外,在相对贫困的指标核算上学术界多采取“一维划线、多维识贫”的做法,采用“双阈值法”计算多维相对贫困指数^[14]。

纵观现有研究,学者们主要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脆弱性框架和社会排斥框架3种分析框架研究搬迁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可持续生计框架认为,家庭生计资本数量和结构无法维持可持续生计策略进而无法跨越“贫困陷阱”,是相对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15]。搬迁在促进贫困户有效增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6]。脆弱性框架认为,外部环境中的个体不可控风险性事件(如疾病、教育等)是阻碍穷人摆脱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16],易地搬迁农户搬迁后面临着失业风险、经济风险、社会融合困境等多种风险,而这类脆弱性群体在遭遇风险时更容易陷入相对贫困^[17]。社会排斥分析框架认为,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结构不完善会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从而产生社会排斥,是造成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18]。搬迁配套政策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的滞后导致搬迁农户遭遇就业、社会保障等结构性和功能性社会排斥,进而导致搬迁农户面临边缘化的困境^[19]。也有学者从政策环境的角度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及其配套扶持政策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认为易地扶贫搬迁具有搬迁对象识别精准、政策体系完备、后续扶持同步布局等特征,让搬迁户有效摆脱了贫困,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20]。易地扶贫搬迁采取集中安置的方式提高了服务的效率和均等性,在促进农户增收的同时降低了收入差距^[21],可以有效缓解搬迁农户的相对贫困状态。

2022年9月

综上所述,学者们虽在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机制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但至少仍有两点需要补充:一是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虽然摆脱了绝对贫困,但仍面临着收入不稳定、基本可行能力不足等的转型性和发展型多维相对贫困问题,新时期随着中国扶贫战略的转型与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措施的逐步实施,需要关注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问题。二是可持续生计、脆弱性和社会排斥3种分析框架都可以用于相对贫困的分析,但3种框架之间不是相互独立,而是存在内在联系的,可以综合运用。鉴于此,本文将风险和社会排斥同时引入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后续扶持政策→生计策略→多维相对贫困”分析框架,并采用形成型结构方程模型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更加全面地分析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生成逻辑以及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机制。

3 理论分析框架

相对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的实际生活状况低于按照社会习俗或所在社会鼓励提倡的平均生活水平的一种状态^[22]。与绝对贫困不同,相对贫困通常不取决于个人的实际生活状况,而是与参照群体紧密相关,更加强调整距性,这里的生活状况不仅包括收入水平,还包括教育、健康、生活质量、社会参与等这些功能性活动所构成的基本可行能力^[23]。基于基本需要和可行能力理论,多维相对贫困包括“贫”和“困”两个方面,既包括反映经济维度的“贫”,也包括发展维度和环境维度的“困”^[2]。于搬迁农户而言,随着城乡融合发展进程的加快和原有绝对贫困人口的城市化搬迁安置所带来的转型性和发展型贫困将成为后搬迁时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表现^[24]。在后脱贫时代,搬迁农户贫困的“相对性”主要源于城乡发展失衡、公共服务承载力不足,表现为搬迁刚脱贫人口所拥有的收入水平、物质条件、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就业水平、政治参与等明显偏低,属于转型性和发展型贫困而不再是生存型贫困问题。

根据可持续生计框架,个人或家庭依靠生计平台(生计资本)选择不同的生计策略,进而产生不同

的生计结果^[25]。个人或家庭的资本积累和生计策略选择往往会受到外部干预的影响,诸如政府政策、政治制度等^[26]。因此,在核心理念上,可持续生计理论提出“制度政策—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后果”的逻辑链条。国务院印发的《2020年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从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基本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供给、农村权益保障(安置房、承包地等)等方面明确了后续扶持政策的重点内容。搬迁农户的生计策略分为纯农业、农业为主务工为辅、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纯务工、非农经营5种类型^[27]。理论上讲,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实施后,搬迁农户基于家庭生计资本禀赋会选择不同的生计策略,进而会影响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状态(生计结果),因此在逻辑上可以形成“后续扶持政策→生计策略→多维相对贫困”这一因果链。

结合脆弱性分析框架和社会排斥分析框架的内容,“后续扶持政策→生计策略→多维相对贫困”的因果链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干扰。一是风险,风险可以被划分为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生产风险和技术风险5种^[28]。风险是脆弱性最为重要的因素,在遭受风险冲击的过程中,受个人禀赋、决策环境以及对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的影响,个体之间的行为决策往往存在不一致^[29],最终影响相对贫困的产生。二是社会排斥,从微观个体的角度看,社会排斥是指个体感知到的被他人或群体排斥在外或者被忽视的现象^[30],如就业排斥感知、社会关系排斥感知、社会福利排斥感知等。社会排斥是能力贫困的根源,表现为不同群体或个人之间的机会不平等。社会排斥导致不同群体与个人在获取社会资源过程中的差异性,最终影响相对贫困^[31]。综合而言,风险和社会排斥不仅会对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产生直接影响,也会后续扶持政策起效和农户生计策略转型产生影响。

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同时引入风险和社会排斥,构建“后续扶持政策→生计策略→多维相对贫困”理论分析框架,系统分析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形成逻辑以及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机制。具体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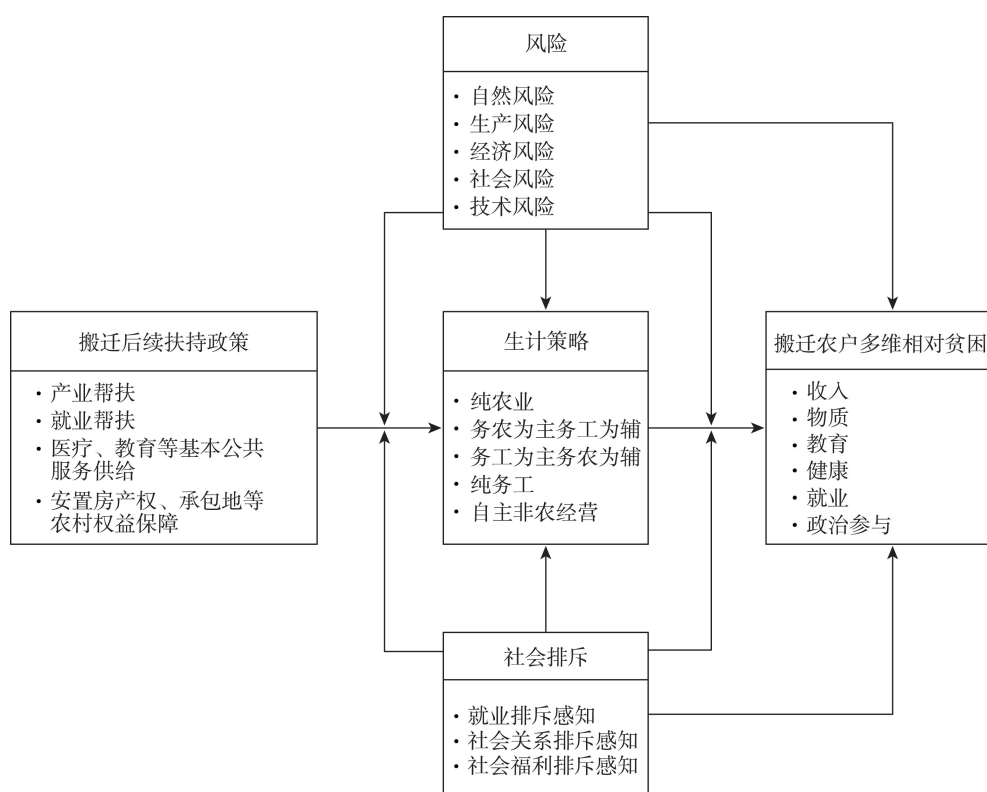


图1 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分析框架

Figure 1 Framework of analysis of follow-up supportive policies of relocation for alleviating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ing households

4 数据来源、变量设计与模型构建

4.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1年7月在安康市紫阳县、岚皋县,商洛市丹凤县、山阳县,渭南市澄城县、合阳县搬迁安置社区所进行的搬迁农户调查。调查问卷以入户问卷为主、社区问卷为辅,结合研究目的,根据预调研和当地实际情况,首先在每个县确定1~2个搬迁安置社区,然后在选取的搬迁安置社区随机抽取150~200户农户进行访谈。调查对象主要为熟悉家庭基本情况、搬迁安置情况,并且能正常沟通的18~65周岁的家庭成员。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搬迁农户家庭人口信息、家庭生计状况、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惠及状况、农户遭遇的风险状况、社区治理状况等。此次调研共完成调查问卷993份,剔除缺失值过多、异常值等无效样本,最终得到966份有效样本,样本有效率为97.28%。

4.2 变量设计及描述性统计

(1)多维相对贫困。结合基本需要理论和可行

能力理论,参考Sen^[23]的研究,从收入、物质、教育、健康、就业、政治参与等多维度衡量相对贫困。参考叶兴庆等^[32]的建议,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作为收入相对贫困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5204元,按照上述比例,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6081.6元的标准划定收入相对贫困线。对于物质、教育、健康、就业等指标和临界值的设定,参考汪三贵等^[13]的研究,并结合搬迁区域农户具体特点进行改进。此外,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工作的意见》(陕政发办[2014]47号),调查区域内的搬迁安置社区采用“原籍管理林和地,安置区管理人和房”的管理模式,根据调研观察,社区管理体制会影响农户政治参与意愿,进而影响搬迁农户的可行能力。故本文中增加了“政治参与”这一指标。具体指标设计如表1所示。

2022年9月

表1 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维度、指标和临界值

Table 1 Dimensions, indicators, and critical values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relocated farming households

指标	临界值	均值	标准差
收入(POV_1)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6081.6元	0.332	0.471
物质(POV_2)	家庭中没有汽车且下列资产不超过3项: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摩托车/电动车、机动三轮车	0.124	0.330
教育(POV_3)	家中至少有1人未上过学且无人有高中及以上学历	0.318	0.466
健康(POV_4)	家中有1个及以上残疾或患重病不能劳动的成员	0.245	0.431
就业(POV_5)	家中18~65周岁健康劳动力中至少有1人无业	0.575	0.494
政治参与(POV_6)	家中无人参加过社区投票选举、居民议事、党/团活动	0.429	0.495

注:搬迁农户相对贫困各维度指标中,若达到临界值赋值为1,若未达到临界值则赋值为0。

(2)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参考国务院印发的《2020年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发改振兴[2020]244号),设置产业帮扶、就业服务、公共服务和权益维护4个指标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的测量指标。

(3)生计策略。参考马明等^[27]的研究,将搬迁农户的生计策略分为纯农业、农业为主务工为辅、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纯务工、非农经营5种类型。

(4)风险。参考Yusuf等^[28]的研究,采用搬迁农户是否遭受自然灾害、是否遭受生产经营亏损、是否面临生活成本过高、是否适应社区生活、是否能获得帮扶信息对自然风险、生产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技术风险5种风险分别进行衡量。

(5)社会排斥。社会排斥既可以定义为宏观层面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不完善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公^[18],也可以定义为微观层面被排斥者主观感知到的被忽视和被拒绝^[33],在测量上具有主观和客观交叉融合的特征,本文主要从微观层面搬迁农户主观感知进行衡量。参考边恕等^[34]的研究,从就业排斥、社会关系排斥与社会福利排斥3个维度衡量搬迁农户的社会排斥感知。具体指标设计如表2所示。

4.3 模型构建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机理,原因在于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处理多个变量因子之间的传导路径。结构方程测量模型分为形成型和反映型两种类型^[35],基于测量指标与潜变量的因果关系以及测量指标的关联性,参考Jarvis等^[36]列出的判定标准,本文宜采

用形成型结构方程模型。形成型结构方程模型由内部结构模型和外部测量模型构成。

内部结构模型:潜变量之间的因果路径分析,其方程表达式为:

$$\eta = \alpha + \Gamma \xi + \zeta \quad (1)$$

式中: η 为内生潜变量向量; ξ 为外生潜变量向量; α 为常数向量; Γ 为路径系数; ζ 为残差向量。本文中的“后续扶持政策”“风险”和“社会排斥”是外生潜变量,“生计策略”和“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是内生潜变量。

外部测量模型:测量指标与潜变量的表征关系分析,其方程表达式为:

$$\xi = \Pi_x x + \delta x \quad (2)$$

$$\eta = \Pi_y y + \delta y \quad (3)$$

式中: x 为外生潜变量向量 ξ 的观测变量; y 为内生潜变量向量 η 的观测变量; Π 为多元回归系数矩阵; δ 为回归残差向量。

本文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对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机制进行参数估计。鉴于基于协方差理论的AMOS、LISRE等软件包无法实现对形成型结构方程模型的运算,因此采用SmartPLS3.0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形成型结构方程可以实现权重的综合计算,因此不再设定跨维度相对贫困“阈值”,这就避免了采用“等权重”估算多维相对贫困可能产生的偏差。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不要求测量指标的样本符合正态分布,允许更多的自由度,且能够对多个变量因子之间的传导路径进行有效估计,因此能较好满足本文研究需要。

表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名称	指标	指标含义和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搬迁后续扶持政策 (POL)	产业帮扶(POL ₁)	对产业帮扶满意程度:1=很不满意;2=不太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很满意	3.117	1.029
	就业服务(POL ₂)	对就业帮扶政策的满意程度:1=很不满意;2=不太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很满意	3.318	1.016
	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POL ₃)	对安置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1=很不满意;2=不太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很满意	3.652	0.843
	搬迁群众合法权益维护(POL ₄)	搬迁后,对政府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的做法的满意程度:1=很不满意;2=不太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很满意	3.192	1.086
生计策略(LIV)	兼业水平	1=纯农业;2=务农为主务工为辅;3=务工为主务农为辅;4=纯务工;5=自主非农经营	3.287	1.107
风险(RIS)	自然风险(RIS ₁)	搬迁后您家是否遭受过自然灾害:0=否;1=是	0.192	0.394
	生产风险(RIS ₂)	搬迁后您家是否遭受过生产经营亏损:0=否;1=是	0.176	0.381
	经济风险(RIS ₃)	搬迁后您家是否遭受过生活成本过高的风险:0=否;1=是	0.704	0.457
	社会风险(RIS ₄)	搬迁后您家是否遭受过不能适应社区生活的风险:0=否;1=是	0.181	0.385
	技术风险(RIS ₅)	搬迁后您家是否遭受过无法获得帮扶信息的风险:0=否;1=是	0.158	0.365
社会排斥(EXL)	就业排斥感知(EXL ₁)	搬迁后您觉得在就业(机会均等)方面可以同本地人享有同等权益吗:5=十分不同意;4=比较不同意;3=一般;2=比较同意;1=十分同意	2.489	1.196
	社会关系排斥感知(EXL ₂)	您同意和本地人相处中没有受到排斥和歧视,能够融洽相处吗:5=十分不同意;4=比较不同意;3=一般;2=比较同意;1=十分同意	2.151	1.165
	社会福利排斥感知(EXL ₃)	搬迁后您觉得在教育、医疗方面可以同本地人享有同等权益吗:5=十分不同意;4=比较不同意;3=一般;2=比较同意;1=十分同意	2.053	0.950

5 结果与分析

5.1 模型评价

结构方程模型评价一般从信度和效度两方面进行分析,而形成型结构方程模型不要求指标具有内部一致性,所以不需要关注信度评价,关键要确保模型效度^[37]。指标效度检验主要分析测量指标权重的显著性和测量指标的多重共线性,结构效度检验主要分析区别效度、内生潜变量判定系数、预测相关性和拟合优度^[38]。

5.1.1 测量模型效度评价

首先,对测量指标权重的显著性进行检验。表3列出了各测量指标对潜变量的权重系数和显著性。从整体来看,大多数测量指标均显著,表明潜变量的指标效度较好。其中,搬迁政策中“合法权益维护(POL₄)”指标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搬迁农户在宅基地退出、安置房不动产登记等合法权益维护方面均参照政策文件统一执行,对搬迁农户相对贫困没有产生明显影响。风险中“自然风险(RIS₁)”

表3 潜变量的测量指标权重及显著性检验结果

Table 3 Weights and test results of significance of measurement indicators of latent variables

路径	权重和显著性	路径	权重和显著性	路径	权重和显著性
POL ₁ →POL	0.518***	RIS ₅ →RIS	0.339*	POV ₂ →POV	0.281***
POL ₂ →POL	0.393***	RIS ₄ →RIS	0.480**	POV ₃ →POV	0.138***
POL ₃ →POL	0.370***	RIS ₅ →RIS	0.440**	POV ₄ →POV	0.310***
POL ₄ →POL	0.047	EXL ₁ →EXL	0.587***	POV ₅ →POV	0.030
LIV→LIV	1.000***	EXL ₂ →EXL	0.291***	POV ₆ →POV	0.128**
RIS ₁ →RIS	0.282	EXL ₃ →EXL	0.342***		
RIS ₂ →RIS	0.008	POV ₁ →EXL	0.786***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2022年9月

“生产风险(RIS_2)”2个指标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农户搬迁后大多选择从事非农就业,农业生产活动减少,因此这两类风险影响不显著。多维相对贫困构成指标中“失业(POV_5)”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搬迁农户多从事自由职业,并且还保持着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女性劳动力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就业模式,存在隐蔽性失业的情况。

其次,对测量指标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主要观察方差膨胀因子(VIF),有学者认为 VIF 只要低于10便可认为测量指标之间不具有多重共线性^[39],从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各测量指标的 VIF 值均低于2.0,说明测量指标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指标效度较好。

5.1.2 结构模型检验

区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是检验结构模型效度的重要标准之一,区别效度越小,说明潜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就越弱,模型的结构越稳定。一般认为潜变量之间区别效度的绝对值小于0.7就说明潜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弱,模型具有充分的结构效度^[40]。从表5的结果可以看出,潜变量之间区别效度的绝对值均小于0.7,表明模型结构具有稳定性。

内生潜变量判定系数 R^2 反映了内生变量被解释的程度,Chin^[35]将判定系数分为较好(0.67)、中等(0.33)和较差(0.19)3个水平。模型结果显示,内生

潜变量生计策略的 R^2 值为0.144,多维相对贫困的 R^2 值为0.378,内生潜变量判定系数适中,说明搬迁后续扶持政策、风险、社会排斥对生计策略和多维相对贫困的解释程度适中。

预测相关性(Predictive relevance(Q^2))主要反映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力,是评价结构效度的重要指标, $Q^2 > 0$,表明观察值重构较好,模型具有预测相关性, $Q^2 \leq 0$,则表明缺少预测相关性, Q^2 越大代表预测相关性越强,一般分为0.02(低)、0.15(中)、0.35(高)3个标准^[41],模型检测结果显示,内生潜变量生计策略 Q^2 的值为0.082,多维相对贫困 Q^2 的值为0.072,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相关性。

拟合优度(Goodness of Fit)是反映模型适配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判定结构效度的重要指标,Ten-nenhaus^[42]曾提出一个PLS通径模型的整体适配度指标 GoF ,即外部测量模型平均公因子方差和内生潜变量平均测定系数的几何平均数。 GoF 值阈在0和1之间, GoF 值越大表示路径模型估计越好,模型结果显示 GoF 的值为0.885,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

综上所述,本文测量模型中测量指标能较好地代表潜变量的构念,测量指标之间不具有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构模型中潜变量的区别效度较好,模型解释力度适中,并且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相关性和拟合优度,说明模型设定与应用是合理的。

表4 测量指标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VIF)

Table 4 Multicollinearity test results of measurement indicators

指标	VIF	指标	VIF	指标	VIF
POL_1	1.284	RIS_3	1.036	POV_2	1.026
POL_2	1.397	RIS_4	1.196	POV_3	1.024
POL_3	1.276	RIS_5	1.220	POV_4	1.037
POL_4	1.397	EXL_1	1.576	POV_5	1.040
LIV	1.000	EXL_2	1.271	POV_6	1.014
RIS_1	1.425	EXL_3	1.634		
RIS_2	1.461	POV_1	1.050		

表5 潜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

Table 5 Correlation test of latent variables

潜变量	后续扶持政策	生计策略	社会排斥	多维相对贫困
生计策略	0.221			
社会排斥	-0.268	-0.289		
多维相对贫困	-0.266	-0.557	0.301	
风险	-0.180	-0.038	0.224	0.222

5.2 风险和社会排斥对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形成的影响

根据表3的结果,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技术风险3个测量指标对风险潜变量的权重显著,根据表6的结果,风险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包括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技术风险在内的风险遭遇会导致搬迁农户直接陷入多维相对贫困。调研中发现,安置社区居住的人群中,老人、妇女、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占比高,这类人群文化水平低、就业技能差,收入水平低,刚性开支又比较大,面临较多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进而导致收入水平仅略高于“贫困线”,可行能力较弱。搬迁农户社会空间的割裂与重塑导致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关系逐渐淡化,社会融入困难,这种社会风险会使得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生产模式逐渐被市场化的生产模式取代,持续拉大富裕者与贫困者在分化格局中的差距,从而导致农户陷入多维相对贫困。

根据表3的结果,就业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和社会福利排斥3个测量指标对社会排斥潜变量的权重显著,根据表6的结果,社会排斥对农户多维相对贫

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包括就业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和社会福利排斥在内的社会排斥会导致搬迁农户直接陷入多维相对贫困。调研中发现,搬迁安置区虽大部分属于城镇安置,但有不少社区处于城郊,距离县城中心仍较远,就近就业存在困难,并且有的安置区外出务工动员组织力度还不够,再加上公益性岗位较少并且待遇一般,工资性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相比存在差距,这种就业排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出现。由于安置区建设时间较短,不少公共服务配套建设滞后,例如搬迁农户在城里就医还要回迁出地报销,有的安置区学校大班额问题突出等,这种社会福利排斥也会导致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形成。

根据表6结果,农户生计策略对多维相对贫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生计策略越多元化,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水平越低,说明搬迁农户生计策略能否实现非农转型会对其多维相对贫困状态产生重要影响。而根据表6,社会排斥对搬迁农户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通过生计策略对多维相对贫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搬迁农户在面临社会排斥时,机会的剥夺阻碍了其生计策略转

表6 后续扶持政策对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调节效应和总效应

Table 6 Direct effect, indirect effect, adjustment effect, and total effect of follow-up supportive policies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relocated farming households

效应	路径	系数	路径调节系数
直接效应	后续扶持政策→生计策略	0.167***	0.030
	风险→生计策略	0.072	0.006
	社会排斥→生计策略	-0.245***	0.062
	后续扶持政策→多维相对贫困	-0.097***	0.013
	生计策略→多维相对贫困	-0.501***	0.334
	风险→多维相对贫困	0.150**	0.033
	社会排斥→多维相对贫困	0.088***	0.010
间接效应	后续扶持政策→生计策略→多维相对贫困	-0.084***	—
	风险→生计策略→多维相对贫困	-0.036	—
	社会排斥→生计策略→多维相对贫困	0.123***	—
调节效应	后续扶持政策×风险→生计策略	-0.061	0.005
	后续扶持政策×社会排斥→生计策略	-0.160**	0.036
	风险×生计策略→多维相对贫困	0.096***	0.014
	社会排斥×生计策略→多维相对贫困	-0.025	0.001
总效应	风险→多维相对贫困	0.114**	—
	社会排斥→多维相对贫困	0.211***	—
	后续扶持政策→多维相对贫困	-0.181***	—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2022年9月

型,进而导致了多维相对贫困形成。

5.3 后续扶持政策对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机制

将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生计策略、风险、社会排斥、多维相对贫困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分析其内部传导机理,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整个系统进行综合估计,所得结果如图2所示。图2较为直观地展现了各个潜变量的权重以及后续扶持政策缓解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调节效应和总效应。其中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在图中可以直观得到,间接效应通过直接效应乘积得到,总效应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加总得到。例如,收入相对贫困对总体多维相对贫困的权重为0.786,表明收入多维相对贫困每增加1个标准差,总体多维相对贫困将提高0.786个标准差;“生计策略→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系数为-0.501,说明搬迁农户生计策略每提高1个标准差,多维相对贫困水平将降低0.501个标准差。

基于收入水平和可行能力的角度分析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构成。根据图2,在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构成中,收入水平(POV_1)所占的比重最大

(0.786),表明促进搬迁农户收入稳定增长,确保其不返贫是缓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目标。物质(POV_2)、教育(POV_3)、健康(POV_4)、政治参与(POV_6)均显著,表明提升由功能性活动所构成的基本可行能力,也是缓解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重点内容。

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潜变量的测量指标中,产业帮扶(POL_1)所占的比重最大(0.518)并且显著,表明集中安置区周边规划配套产业的发展对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重要作用。产业帮扶要继续实现安置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多种商贸业态的形成和发展。就业服务(POL_2)所占的比重次之(0.393),表明在“搬得出”问题基本解决后,多举措促进搬迁户就业就成为实现搬迁农户稳定脱贫目标的重要举措。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POL_3)的完善对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包括教育、医疗等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可以有效促进困难群众基本可行能力的提升,进而缓解多维相对贫困。

根据图2,后续扶持政策对生计策略具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多维相对贫困具有直接显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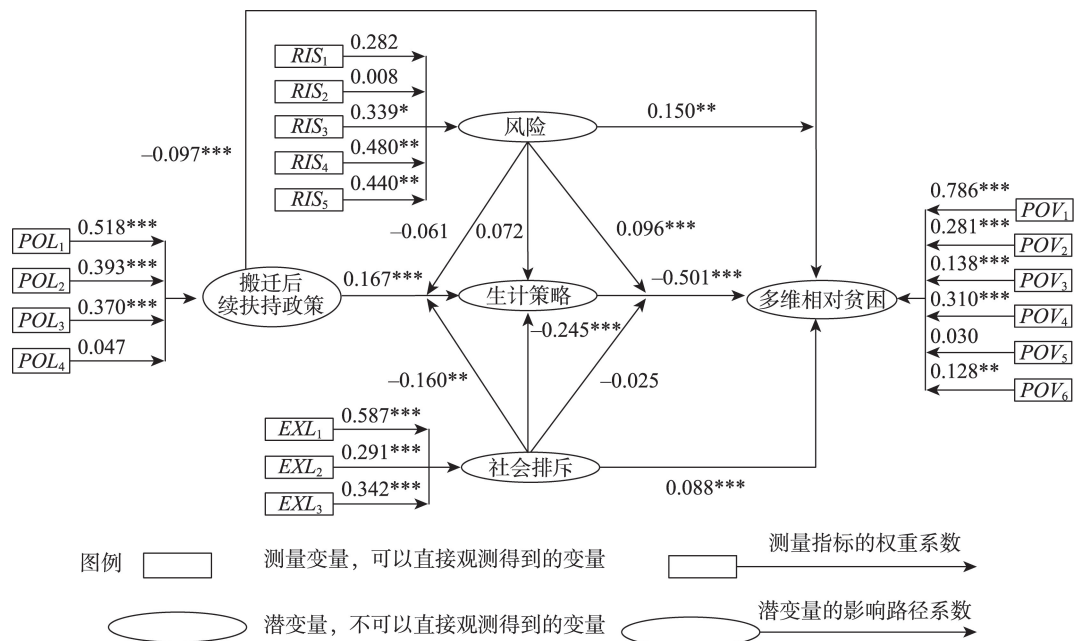


图2 后续扶持政策缓解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机理的参数估计

Figure 2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 of relocated farming households by follow-up supportive policies

负向影响,并且根据表6,“后续扶持政策→生计策略→多维相对贫困”这一间接路径显著为负,表明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有效促进了搬迁农户生计策略转型进而有效缓解了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搬迁农户生计策略转型是缓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关键,但是“后续扶持政策→生计策略→多维相对贫困”的因果链又受到了风险和社会排斥两个因素的干扰。根据表6结果,“后续扶持政策→生计策略”显著为正,而“后续扶持政策×社会排斥→生计策略”显著为负,说明社会排斥抑制了后续扶持政策促进搬迁农户生计转型的积极作用。可能的原因是搬迁农户在面临社会排斥时无法充分享受后续扶持政策带来的福利,抑制了其生计策略转型。“生计策略→多维相对贫困”显著为负,而“生计策略×风险→多维相对贫困”显著为正,说明在搬迁农户生计策略转型缓解多维相对贫困的过程中,风险会减弱生计策略转型的减贫效应。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结合相对贫困理论和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特征,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将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生计策略、风险、社会排斥、多维相对贫困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采用形成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后续扶持政策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以完善产业、就业帮扶和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为重点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可以有效改善农户生计策略进而缓解农户相对贫困(-0.181)。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可直接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0.097),也可以有效促进农户生计策略非农转型进而间接缓解其多维相对贫困(-0.084)。其中,产业帮扶(0.518)、就业服务(0.393)和基本公共服务(0.370)构成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显著因素。

(2)社会排斥和风险均是搬迁农户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直接因素。其中,社会排斥对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0.088),搬迁农户在面临就业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和社会福利排斥时会出现就业困难、收入降低、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弱等问题,从而陷入多维相对贫困;风险对农户多

维相对贫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0.150),搬迁农户面临的生活成本过高、社区适应困难、无法获取帮扶信息等风险均会让搬迁农户陷入多维相对贫困。

(3)在“后续扶持政策实施→生计策略改善→多维相对贫困降低”这条政策减贫路径中,社会排斥和风险均会起到负面作用。在“后续扶持政策→生计策略”路径中,社会排斥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0.160),表明在政府通过后续扶持政策改善搬迁农户生计策略的过程中,农户所面临的社会排斥会削弱政策的这种积极效应;在“生计策略→多维相对贫困”路径中,风险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0.096),表明搬迁农户在通过生计策略转型缓解多维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农户所遭遇的风险冲击会抑制这种积极效应。

6.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对相对贫困治理的靶向性。目前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主要目的是帮助搬迁户“稳得住、能发展”,但对于多维度的相对贫困治理的指向性和目标仍不够明确。因此,未来需要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顶层设计,提前考虑“十四五”以后易地搬迁后续扶持的发展和对相对贫困治理的系统化精准施策。

(2)鉴于产业、就业帮扶和基本公共服务在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中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中的重要性,地方政府需要继续积极为搬迁户就业创造有利条件,如整合安置点周边资源促进产业发展,在安置区周边提供农业和非农业的就业岗位,使搬迁户能够近距离、低成本地解决就业问题。培育安置区新型经营主体(如扶贫车间、社区工厂等)就地就近创业和优化产业带贫能力。制定就业激励措施,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培训,因地制宜进行实用技术培训等,更好地促进农户生计策略非农转型。

(3)探索搬迁区域致贫风险防范新机制。政府农业部门可以结合往年自然风险导致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减产数量等数据及历年农产品价格波动数据,预测未来的自然风险及市场风险。加大对兼业户和产业帮扶户的资金支持力度,降低农户贷款门

2022年9月

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搬迁低收入人口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同当地居民享有平等的权利,提高搬迁农户对自己属于本地人的心理认同感,降低搬迁农户面临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

(4)完善社区治理,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建立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体制,降低和化解社区矛盾。统筹县城内医疗、教育服务资源,提高公共服务质量。通过就业服务、福利保障、社会工作服务等多种政策工具,逐步消除这些领域中对于搬迁相对贫困人口的社会排斥,引导搬迁群众尽快实现社会融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吴振磊,王莉.我国相对贫困的内涵特点、现状研判与治理重点[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0(4):16-25.[Wu Z L, Wang L. Relative poverty: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present situation study and judgement and the key point of management[J].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0, 50(4): 16-25.]
- [2] 王小林,冯贺霞.2020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J].中国农村经济,2020,(3):2-21.[Wang X L, Feng H X. China's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standards in the Post-2020 Era: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policy orientation[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0, (3): 2-21.]
- [3] 黄祖辉.新阶段中国“易地搬迁”扶贫战略:新定位与五大关键[J].学术月刊,2020,52(9):48-53.[Huang Z H.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five key points of “Relo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stage[J]. Academic Monthly, 2020, 52(9): 48-53.]
-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伟大成就与实践经验[J].宏观经济管理,2021,(9):4-9.[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13th Five-Year Pla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Great achievements and practice experience[J].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2021, (9): 4-9.]
- [5] 张二申,乔家君,周亚娟,等.易地扶贫搬迁户收入结构差异归因及优化路径[J].经济地理,2022,42(1):144-151.[Zhang E S, Qiao J J, Zhou Y J, et al. Causes of income structure difference and its optimized path for the relocated farmers of poverty allevi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1): 144-151.]
- [6] 李聪,刘若鸿,许晏君.易地扶贫搬迁、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不平等:来自陕南的证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9,(7):52-67.[Li C, Liu R H, Xu Y J.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and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the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9, (7): 52-67.]
- [7] 管睿,余劲.外部冲击、社会网络与移民搬迁农户的适应性[J].资源科学,2020,42(12):2382-2392.[Guan R, Yu J. External shocks, social networks and adaptability of resettled farming households[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12): 2382-2392.]
- [8] 谢治菊.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困境与对策建议[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15):112-127.[Xie Z J. Resolving the governance dilemma facing the communities of relocated poor people[J]. Frontiers, 2021, (15): 112-127.]
- [9] 武汉大学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研究课题组.易地扶贫搬迁的基本特征与后续扶持的路径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20,(12):88-102.[Research group of Wuhan University on follow-up support for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ath selections of the follow-up support[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0, (12): 88-102.]
- [10] 左停,贺莉,刘文婧.相对贫困治理理论与中国地方实践经验[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6):1-9.[Zuo T, He L, Liu W J. Theory of relative poverty control and China's local practical experience[J]. Journal of H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21(6): 1-9.]
- [11] 张琦,杨铭宇,孔梅.2020后相对贫困群体发生机制的探索与思考[J].新视野,2020,(2):26-32.[Zhang Q, Yang M Y, Kong M.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mechanism of relative poverty groups after 2020[J]. Expanding Horizons, 2020, (2): 26-32.]
- [12] 魏后凯.2020年后中国减贫的新战略[J].中州学刊,2018,(9):36-42.[Wei H K. The New strategy for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after 2020[J].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18, (9): 36-42.]
- [13] 汪三贵,孙俊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的相对贫困标准、测量与瞄准:基于2018年中国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1,(3):2-23.[Wang S G, Sun J N. China's relative poverty standards, measurement and targeting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China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survey in 2018[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1, (3): 2-23.]
- [14] Alkire S, Foster J.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7, 95(7-8): 476-487.
- [15] 王昶,王三秀.相对贫困长效治理与政府扶贫能力转型: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拓展应用[J].改革,2021,(5):134-145.[Wang C, Wang S X. Long-term governance of relative pover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al anti-poverty ability: Based on entended application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theory[J]. Reform, 2021, (5): 134-145.]
- [16] 胡志平.基本公共服务、脱贫内生动力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J].求索,2021,(6):146-155.[Hu Z P. Basic public services,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governance of rural rela-

- tive poverty[J]. *Seeker*, 2021, (6): 146–155.]
- [17] 刘升. 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6): 94–100. [Liu S.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tability risk of relocation alleviation community of the urban centralized resettlement type[J].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0, (6): 94–100.]
- [18] 方长春. 中国城市移民的住房: 基于社会排斥的视角[J]. *社会学研究*, 2020, 35(4): 58–80. [Fang C C. Housing for China's urban immigr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xclusion[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20, 35(4): 58–80.]
- [19] 董亮, 邓文. 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困境与社会排斥: 基于青海格尔木市昆仑民族文化村的调查[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 40–44. [Dong L, Deng W. Ecological immigration social adaptation dilemma and social exclusion: Survey of Kunlun national cultural village, Golmus, Qinghai[J]. *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17, (3): 40–44.]
- [20] 黄云平, 谭永生, 吴学榕, 等. 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及其后续扶持问题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20, (10): 27–33. [Huang Y P, Tan Y S, Wu X R, et al. Research on the relo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ts follow-up support in China[J].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20, (10): 27–33.]
- [21] 朱永甜, 余劲.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陕南三市1680份农户数据[J]. *资源科学*, 2021, 43(10): 2013–2025. [Zhu Y T, Yu J.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farmers' income and income gaps: A case study of 1680 households in Southern Shaanxi[J]. *Resources Science*, 2021, 43(10): 2013–2025.]
- [22] Townsend P.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 [23] Sen A.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4] 邢成举, 李小云. 相对贫困与新时代贫困治理机制的构建[J]. *改革*, 2019, (12): 16–25. [Xing C J, Li X Y. Relative pover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verty governance mechanism in the new era[J]. *Reform*, 2019, (12): 16–25.]
- [25] DFID U K.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M].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9.
- [26] Deere C D. Assets, livelihoods, and social policy[J]. *Feminist Economics*, 2008, 16(2): 151–153.
- [27] 马明, 陈绍军, 陶思吉, 等.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策略、生计资本与家庭收入影响研究: 以云南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8): 1–10. [Ma M, Chen S J, Tao S J, et al. Livelihood strategy, livelihood capital and family income of immigrants involved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in deeply impoverished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1, 35(8): 1–10.]
- [28] Yusuf S A, Ashagidigbi W M, Bwala D P. Poverty and risk attitude of farmers in North-Central, Nigeri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5, 3: 1–7.
- [29] Weber E U, Blais A R, Betz N E. A domain-specific risk-attitude scale: Measuring risk perceptions and risk behaviors[J].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002, 15(4): 263–290.
- [30] Williams K D. Ostracism[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7, 58: 425–452.
- [31] Sen A. Social Exclusion: Concept, Application, and Scrutiny[M]. Office of Environ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0.
- [32] 叶兴庆, 殷浩栋. 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 中国减贫历程与2020年后的减贫战略[J]. *改革*, 2019, (12): 5–15. [Ye X Q, Yin H D. From eliminating absolute poverty to alleviating relative poverty: China's history of poverty reduc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after 2020[J]. *Reform*, 2019, (12): 5–15.]
- [33] Howard M C, Cogswell J E, Smith M B. The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workplace ostracism: A meta-analysis[J]. *Th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20, 105(6): 577–596.
- [34] 边恕, 纪晓晨. 社会排斥对中国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CFPS 2018的经验分析[J]. *社会保障研究*, 2021, (3): 87–99. [Bian S, Ji X C. Study on the effect of social exclusion on relative poverty in China: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CFPS 2018[J].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2021, (3): 87–99.]
- [35] Chin W W.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M].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8.
- [36] Jarvis C B, Mackenzie S B, Podsakoff P.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struct indicators and measurement model specification in marketing and consumer research[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3, 30(2): 199–218.
- [37] Diamantopoulos A. The error term in formative measurement models: Interpretation and modeling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Modeling in Management*, 2006, 1(1): 7–17.
- [38] Urbach N, Ahlemann 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using partial least squares[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2010, 11(2): 5–40.
- [39] Gujarati D N. Basic Econometrics[M]. New York: McGraw-Hill, 2003.
- [40] Bruhn M, Georgi D, Hadwich K. Customer equity management as formative second-order construct[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8, 61(12): 1292–1301.
- [41] Muller K.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J]. *Technometrics*, 1988, 31(4): 499–500.
- [42] Tenenhaus M, Vinzi V E, Chatelin Y M, et al. PLS path modeling[J].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 Data Analysis*, 2005, 48(1): 159–205.

Impact of the follow-up supportive policies of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on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ing households

HUANG Zhigang, LI Ji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As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has changed from eliminating absolute poverty to alleviating relative poverty in the new stage, the follow-up supportive policies of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relocati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policy on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alleviation of farming households. This study introduced risk and social exclusion into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d constructed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follow-up supportive policies → livelihood strategies →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t adopted a formativ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conduct empirical analysis of survey data of relocated farmer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The follow-up supportive policies including industrial, employment, public service, and so on have effectively alleviated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0.181). Specifically, these policies can directly reduce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ing households (-0.097),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ies, thereby indirectly alleviating their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0.084). (2) Risk (0.150) and social exclusion (0.088) directly lead to the falling of relocated farming households into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When the relocated farmers are faced with social exclusion and risk, they will have difficulties in employment, incom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other conditions. (3) The path that follow-up supportive policies allevi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ers by improving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ies will be constrained by social exclusion and risk. Specifically, social exclus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regulatory effect (-0.160) in the process of follow-up supportive policies promoting farming household livelihood transition, and risk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gulatory effect (0.096) in the proces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follow-up supportive policies of reloc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precise implementation of follow-up supportive policies for the governance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Key words: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follow-up supportive policy; livelihood strategy; risk; social exclusion;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